

園林與隱逸

——六朝文學之新思考^{*}

王力堅

提 要

園林是六朝一個普遍的文化現象；隱逸是六朝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而六朝衆多的寫景詩、文、賦中，園林更是一個常見的描寫對象，以致形成園林文學的類型。事實上，園林、隱逸、園林文學，三者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園林，是士人隱逸思想及相關文學創作的文化載體；士人的隱逸思想，既是園林興起的主要原因，也往往借助園林得以滋長及呈現；園林文化以及借助園林滋長與呈現的士人隱逸思想訴諸筆墨，便形成了六朝興盛一時的園林文學。六朝文人希冀通過園林這一文化載體，以達到避塵世、脫世俗、寄情於山水、嚮往原始自然生活狀態的理想境界，從而獲得心靈的恬靜安適。而這一切，在六朝的園林文學中得到頗為充分的表現。

關鍵詞：六朝 園林 隱逸 園林文學

引 言

園林是六朝一個顯見的文化現象，隱逸則是六朝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而

^{*} 本文為臺灣科技部計劃“園林與隱逸——六朝文學新思考”(MOST 104-2410-H-008-060)部分成果。兩位匿名專家學者的審查意見，使本文受益匪淺，特此謹致深摯謝意。

六朝衆多的寫景詩文賦中,園林更是一個常見的描寫對象,以致形成“園林文學”的類型。事實上,園林、隱逸、園林文學,三者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士人的隱逸思想,既是園林興起的主要原因,也往往借助園林得以滋長及呈現;園林,是士人隱逸思想及相關文學創作的文化載體;通過文字意象得以呈現的園林文化,以及借助園林滋長與呈現的隱逸思想訴諸筆墨,便形成了六朝興盛一時的園林文學。

本文討論的歷史範圍爲“六朝”而非“魏晉南北朝”,後者明確含括魏(含蜀、吳,並含漢末建安,下同)、西晉及北朝,而本文所用“六朝”的概念,則是遵循唐人許嵩《建康實錄》以還,學界乃至社會的一般認知,以定都建康(建業、金陵,今南京)的吳、東晉以及南朝的宋、齊、梁、陳爲歷史發展的主要脈絡,其所據地域主要在南方;然而,基於中原文化傳統延續性考慮,魏與西晉一般也都置於討論範圍。北朝則由於異質文化介入而有較爲複雜的表現,¹因此,北朝當另作專題研究,在本文中則作爲參考比較對象,而未置於議題討論的主軸。這樣一種處理方式,在學界已然爲慣例及常態。

基於以上考慮,本文將以南方的六朝(含括建安—西晉,下同)爲考察中心,亦適當對照參考北朝情形,對六朝的隱逸思想、園林文化,以及園林文學的表現,展開初步的分析探討。

六朝園林雖然在學界得到較充分的研究探討,但六朝園林文學以及其間的隱逸思想,長久以來並未能得到應有的重視甚至是正視,專題研究尙付闕如。就六朝的隱逸思想、園林文化,以及園林文學而言,倘若充分深入展開論述,不同歷史階段、不同地域(尤其南北方),不同政治環境及文化環境,均當有不同的發展變化;而相同歷史階段、相同地域,相同政治環境及文化環境,也都

1 關於北朝因異質文化介入而有較爲複雜的表現,可參曹道衡:《北朝社會環境對學術和文藝的影響》,《周口師範學院學報》,第22卷第1期(2005年1月),頁1—9轉24;金大珍:《北魏都城洛陽在中國歷史文化上的地位——〈洛陽伽藍記〉研究之一》,《大同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17卷第3期(2003年9月),頁37—39;盧有泉:《孕育北朝文學的獨特文化土壤》,《名作欣賞》,2013年第11期,頁4—6轉14;王鐸:《北魏洛陽的佛寺園林》,《華中建築》,第23卷(2005年7月),頁138—140;曹頌今:《北魏都洛四十年洛陽佛寺的變遷》,《洛陽工業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10卷第4期(2000年12月),頁38—40。

會有因人而異的表現。然而，基於本文為本議題的初始討論，同時更限於篇幅，惟能試圖通過諸多不同的個案表現，歸納出具有普遍意義的現象及模式，以期從較宏觀的角度，對六朝的園林文化、隱逸思想以及園林文學，進行交織探討。這就是本文的研究思維與論述架構。

一、六朝園林的稱謂及文化義涵

春秋戰國至秦漢，是皇家園林獨霸天下的時期，甚至可說是皇家園林獨自形成、發展、成熟，並達致鼎盛的歷史過程。六朝，則是士人園林與寺廟園林崛起成型時期。² 士人園林經由模仿（皇家園林）而走向獨立發展，貴遊文化與隱逸文化的交替雜糅構成六朝士人園林的文化底蘊。寺廟園林是六朝宗教文化（佛/道）興盛的副產品或衍生物，宗教文化與隱逸文化同質性態（避塵世/脫世俗）的發展，也致使寺廟園林呈現出與士人園林相類似的文化底蘊。所不同者，士人園林較趨內斂而私密，寺廟園林則相對相容且開放。

六朝時期，皇族與士族的勢力發展此消彼長，交相嬗替，促使皇家園林得以持續發展的同時，也趨向民間化的演變；同時，士人園林也“應運而生”——政治的黑暗（傾軋/殺戮/門閥制度）刺激、助長了隱逸思想。這樣一種政治背景，也成為士人園林文化底蘊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中國園林發展史看，六朝園林的發展顯然不如後世興盛及成熟完善，受重視的程度也大不如後世歷代的園林。然而，從中國園林史階段性進程的角度看，六朝園林毋庸置疑是得到空前發展，成為當時一個顯見的文化現象。雖然六朝園林已無實存，專門的園林文獻亦不多見，然而對六朝園林有所記述的

2 吳功正有“私家園林”的劃分（見下）。六朝期間的私家園林，包括一般的士人園林與皇家成員的園林，甚或是商賈的私園。在本文中，除了特定的語境，一般均稱為“士人園林”。這是由於，六朝期間的商賈園林甚少（明清方為常見），而皇家成員多為文士化，其園林的特徵表現亦已與士人園林大同小異（見後文）。即如論者所指出：“私家園林中的貴族和富商園，均追隨士人園風格。……士人園林擔當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在園林風格上日居主導地位，大大促進了其他園林類型的發展和完善。”見傅晶：《魏晉南北朝園林史研究》（天津：天津大學建築設計及其理論博士學位論文，2003年），頁203。

文史資料仍不為少數,根據文史互證原則,這些資料中有關園林的記述,已為六朝園林研究的主要依據。³ 長期以來,多有學者根據各種文獻資料對六朝園林展開研究。

如吳功正即對六朝皇家、佛家、私家三大園林體系分別進行了考察,認為六朝園林是中國園林史上重要的轉捩期和定型期,從而確定了它在六朝文化史和整個中國園林史上的地位。王毅指出,魏晉以後的皇家園林與士人園林、寺院園林等構成一個內部矛盾且平衡的園林體系,士人園林及其山水審美與園林藝術也在這一時期得到空前發展,園林成為士人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中國士人園林的藝術風格與方法的基本原則,皆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奠定。林敏勝則認為六朝園林是中國園林史上的轉捩點,側重自然景觀的調和,以及象徵物我合一的超然態度。傅品更強調,魏晉南北朝是中國古典園林發展史中的重要轉折期,此時期不但在皇家園林之外出現了士人園林、佛寺園林等新園林類型,還在園林本質上發生了重大飛躍,由秦漢時期的側重滿足物質生活需求,轉向魏晉時代的作為陶冶情操、安頓心靈的精神居所。中國古典園林以山水審美為主題、以寄情賞心為旨歸的獨特精神氣質和藝術風貌,由此逐漸顯化和確立。⁴

總體上說,魏晉時期皇家園林發生嬗變演化,⁵ 士人園林與寺廟園林日漸崛起;至南北朝時期,士人園林與寺廟園林迅速達至空前興盛,形成皇家園林、士人園林、寺廟園林三大類型並存演進的格局與體系。若從南北方相比較而言,晉室南渡後士族社會的分化與演變,促進南朝士人園林的普遍發展;中原皇家園林傳統及“捨宅為寺”風氣助興與佛道文化傳播的合流,致使北朝寺廟

³ 事實上,對六朝園林有所記述的詩文賦也正是六朝園林文學得以成型的主要體現。

⁴ 分別見吳功正:《六朝園林》(南京:南京出版社,1992年);及《六朝園林文化研究》,《中國文化研究》,1994年第1期,頁108—117;王毅:《中國園林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林敏勝:《六朝園林研究》(臺中:中興大學歷史所碩士學位論文,1996年);傅品:《魏晉南北朝園林史研究》。

⁵ 跟兩漢皇家園林相比,魏晉時期皇家園林的政治祭儀功能不斷弱化,遊賞娛樂功能逐漸強化。參鄭在書:《苑囿:書寫帝國的空間——以〈子虛〉、〈上林〉兩賦為例》,載李豐楙、劉苑如編:《空間、地域與文化——中國文化空間的書寫與闡釋》(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02年),頁133—155。

園林尤見發達。⁶

六朝期間，各種園林的規模範圍與林木山石池亭等造園元素的種類儘管會有大小多寡之別，尤其處於發展初始階段的士人園林，各種要素的布局設計及建築規模尚處於動態演化之中，然而，山水兼備，花樹交雜，野趣盎然的“人化自然”（即“第二自然”）本質已然確定；而這樣一種“人化自然”的本質，往往交織著人們好尚自然、嚮往隱逸的思想意趣。

隱逸思想意趣在士人園林中得到最為充分的表現，基於此，本文以六朝士人園林為主要的探討對象（詳見後文）。儘管如此，也不排除隱逸思想意趣表現在寺廟園林、皇族成員的私園，甚至皇家園林。寺廟園林有如攝山棲霞寺：“高僧迹共遠，勝地心相符。樵隱各有得，丹青獨不渝。”⁷ 皇家園林有如華林園：“簡文帝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⁸ 儘管其間隱逸心態、園林意義有別，但本文所要關注的，當是園林與隱逸思想的結合，或說是借助園林以體現隱逸思想的模式。

六朝之前，關於園林的稱謂有“園”、“圃”、“囿”、“苑”⁹等，至六朝期間，有關園林的主要稱謂便是“園林”，六朝詩文中即不乏“園林”的稱謂，諸如：“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¹⁰“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¹¹“獨夫既除，蒼生甦息。便欲歸志園林，任情草澤。”¹²“園林多趣賞，祓禊樂還尋。”¹³這些詩文所用

6 南朝佛教最盛時，建康佛寺有 700 餘所；北朝佛教最盛時，洛陽佛寺有 1367 所。相比之下，後者尤見發達之勢。參周維權：《中國古典園林史》（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112。有關六朝寺廟園林以及“捨宅為寺”風氣，筆者有專文《魏晉南北朝的寺廟園林與文學》（尚未發表）討論，在此不贅。

7 江總：《入攝山棲霞寺詩》，載遼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頁 2583。

8 劉義慶：《世說新語·言語》，劉義慶撰，徐震堦校箋：《世說新語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頁 67。

9 參傅品：《魏晉南北朝園林史研究》，頁 6。

10 張翰：《雜詩》其一，《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737。

11 陶淵明：《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詩》其二，同上，頁 982。

12 蕭衍：《淨業賦並序》，《全梁文》，卷 1，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58 年），頁 2950。

13 陳叔寶：《祓禊泛舟春日玄圃各賦七韻詩》，《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2516。

之“園林”概念，含義或各有異，如陶淵明（約 365—427）與陳叔寶（553—604）之“園林”，顯然不可同日而語，前者當為隱者的遊憩地，後者則是權貴的尋樂園，但在“人化自然”的意義上有了交集，故可共同冠以“園林”的稱謂。

當然，也有以其他稱謂出現的園林。六朝園林往往跟家居建築結合，為居住環境的有機組成部分，因此，附屬於居住環境的園林是常見的形態。這類園林，往往便以“宅園”、“後園”等稱謂出現，相比之下，“後園”稱謂更為常見且尤為值得注意。

所謂“後園”，儘管其原意或為方位所致，但魏晉時常用以指稱皇家園林，諸如：“帝於後園為象母起觀，名其里曰渭陽。”¹⁴“同乘並載，以遊後園……景風扇物，天氣和暖，眾果具繁，時駕而遊。”¹⁵“御幸式乾殿及遊豫後園，皆大臣侍從。”¹⁶“炫耀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¹⁷“可絕後園習騎乘馬，出必御輦乘車。”¹⁸“帝至後園竹間戲，或與從官攜手共行。”¹⁹“有感聖皇，既蒙引見，又宴於後園。”²⁰這些皇家“後園”所呈現的，莫不是皇族帝家的生活畫面。潘尼（約 250—約 311）《後園頌》雖名為後園之頌，然而所頌的主體卻無疑是“明明天子，肅肅庶官；文士濟濟，武夫桓桓”的君臣氣勢聲威，以及“長筵遠布，廣幕四周；嘉肴惟芳，旨酒思柔”的皇家遊宴場面；其間所點染的，也大抵是“岩岩峻岳，湯湯玄流；翔鳥鼓翼，遊魚載浮”的玄奧虛杳景觀，以及“黍稷既登，貨財既豐；仁風潛暢，皇化彌崇”的奢華富庶氣象。²¹

南朝時，“後園”則多為指稱私園，諸如：“郗詵葬母後園，而身登宦。”²²“逢君後園宴，相隨巧笑歸。”²³“王（蕭子良）嘗置酒後園，有晉相謝安鳴琴在側，以

14 《世說新語·言語》注引《魏書》，《世說新語校箋》，頁 40。

15 曹丕：《與朝歌令吳質書》，蕭統編，李善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頁 591。

16 何晏：《奏請大臣侍從遊幸》，《全三國文》，卷 39，《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 1273。

17 張茂：《上書諫明帝奪士女以配戰士》，同上，卷 40，頁 1281。

18 孔晏父：《奏諫齊王》，同上，卷 44，頁 1301。

19 司馬孚：《奏永寧宮》，《全晉文》，卷 14，《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 1540。

20 陸雲：《從事中郎張彥明為中護軍詩序》，《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700。

21 潘尼：《後園頌》，《全晉文》，卷 94，《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 2002。

22 鄭鮮之：《滕羨仕宦議》，《全宋文》，卷 25，《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 2571。

23 謝朓：《詠落梅詩》，《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1436。

授暉，暉彈爲雅弄。”²⁴“光風轉蘭蕙，流月泛虛園。”²⁵“誰能北窗下，獨對後園花。”²⁶“早知長信別，不避後園輿。”²⁷這些私園，爲文士們寄情山水，暢散心懷的處所：“追夏德之方暮，望秋清之始飆，藉宴私而遊衍，時寤語而逍遙。爾乃日棲榆柳，霞照夕陽，孤蟬已散，去鳥成行。惠氣湛兮帷殿肅，清陰起兮池館涼。”²⁸

六朝時期，已出現皇家園林私人化現象，某些皇族成員也擁有自己的園林，如齊文惠太子蕭長懋（458—493）的玄圃與小苑、梁湘東王蕭繹（508—554）的湘東苑等。這類園林雖然仍存留幾分皇家氣象，但更多的還是怡情逸致的氛圍：“右瞻則青溪千仞，北睹則龍盤秀出。與歲月而荒茫，同林藪之蕪密。歡茲嘉月，悅此時良。庭散花蕊，傍插筠簞。灑玄醪於沼沚，浮絳棗於泱泱。觀翠綸之出沒，戲青舸之低昂。”²⁹若是文士化皇族的私園，更是成爲文士遊娛唱和場所，相關的作品多以“批量化”方式呈現。如蕭繹所作有關“後園”題材的詩便有《後園看騎馬詩》、《晚景遊後園詩》、《遊後園詩》、《落日射鰲詩》、《後園作回文詩》等，他人所唱和的詩作則有王融（476—493）的《後園作回文詩》、蕭綱（503—551）的《和湘東王後園回文詩》、蕭綸（507—551）的《和湘東王後園回文詩》、蕭祗的《和回文詩》等。

鑒於蕭綱、蕭繹等人的皇族身份，其“後園”當是有一定規模的園林，但這些皇族後園詩所表現的，卻大多沒有如前引皇家園林那種恢弘氣象，反而多了幾分文士蕭散氣息：“隱淪遊少海，神仙入太華。我有逍遙趣，中園復可嘉。千株同落葉，百丈共尋霞。”³⁰其實，蕭子良（460—494）、蕭綱與蕭繹等人所謂的“後園”是自己的私園還是皇家園林並不重要，關鍵在其中所體現的隱逸思想，或園林與隱逸思想結合的模式。

蕭綱《臨後園詩》內文“中園復可嘉”的“中園”一語，其意當爲“後園中”。

24 《梁書·柳惔傳》，姚思廉撰：《梁書》，二十五史編刊館：《二十五史》（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62年），頁1795。

25 王儉：《後園餞從兄豫章詩》，《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1380。

26 何遜：《閨怨詩》其二，同上，頁1380。

27 蕭綱：《怨歌行》，同上，頁1907。

28 謝朓：《遊後園賦》，《全齊文》，卷23，《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2920。

29 蕭子範：《家園三月三日賦》，《全梁文》，卷23，《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3084。

30 蕭綱：《臨後園詩》，《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1966。

六朝詩文常見“中園”語，抑或因倒裝句法可解為“園中”，如李善注本《文選》中，謝靈運《田南樹園激流植援》“中園屏氛雜，清曠招遠風”句之“中園”，六臣注本則作“園中”。³¹ 從所處語境看，此類“園”多指稱私園，除了前引蕭綱詩及謝靈運詩外，還有諸如：“魚瀼潏兮鳥繽翻，澤雉遊臯兮戲中園。”³² “春秋代謝，有務中園。”³³ “余之中園，有仙人草焉。”³⁴ “化為中園實，其下成路衢。”³⁵ “信美非吾室，中園思偃仰。”³⁶ “穀巾取於丘嶺，短褐出自中園。”³⁷ “顧念張仲蔚，蓬蒿滿中園。”³⁸

上引諸例之“園”，儘管有莊園式、田園式、花草園式、庭院式、山林寺觀式等不同模式，其間所反映的“以園林為隱所”的心態卻是一致的。

需注意的是，園林式的庭院（或稱庭院園林化）在六朝頗為普遍，六朝詩中便屢屢可見此類描寫：“回顧覽園庭，嘉木凋綠葉。”³⁹ “前庭樹沙棠，後園植烏桺。”⁴⁰ “庭槐振藻，園桃阿那。”⁴¹ “茂草籠庭，滋蘭拂牖。”⁴² “欄庭多落葉，慨然知已秋。”⁴³ “白露滋園菊，秋風落庭槐。”⁴⁴ “窗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⁴⁵ 花草樹木與庭院建築相容無間，實為居住環境的有機組成元素。

寺廟園林化的現象更為突出，南方寺廟園林化的表現有如：“康僧淵在豫

31 《文選》，頁 427；《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1172。《詩經》已有類似的用法，如《詩·周南·葛覃》：“葛之覃兮，施於中谷。”毛《傳》：“中谷，谷中也。”孔《疏》：“中谷，谷中，倒其言者，古人之語皆然，詩文多此類也。”參鄭玄注，孔穎達疏：《毛詩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年，影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重刊宋本），頁 30。此處語言現象的解釋，得益於一位朋友的建言及筆者同仁李淑萍教授的指教，特此致謝。

32 石崇：《思歸歎》，《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644。

33 陶淵明：《自祭文》，《全晉文》，卷 112，《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 2103。

34 謝惠連：《仙人草贊並序》，《全宋文》，卷 34，《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 2624。

35 沈約：《麥李詩》，《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1651。

36 謝朓：《直中書省詩》，同上，頁 1431。

37 劉峻：《東陽金華山棲志》，《全梁文》，卷 57，《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 3290。

38 江淹：《雜體詩·左記室思詠史》，《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1574。

39 陳琳：《詩》，《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368。

40 潘岳：《金谷集作詩》，同上，頁 633。

41 陸雲：《失題》其三，同上，頁 715。

42 湛方生：《後齋詩》，同上，頁 943。

43 陶淵明：《酬劉柴桑》，同上，頁 978。

44 謝惠連：《擣衣詩》，同上，頁 1194。

45 謝朓：《郡內高齋閑坐答呂法曹》，同上，頁 1427。

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旁連嶺，帶長川，芳林列於軒庭，清流激於堂宇。”⁴⁶
 “（慧遠）創造精舍，洞盡山美，卻負香爐之峰，傍帶瀑布之壑。仍石壘基，即松栽構，清泉環階，白雲滿室。”⁴⁷“（同泰寺）禪窟禪房，山林之內，東西般若，臺各三層，築山構隴，亘在西北，栢殿在其中。東南有旋璣殿，殿外積石種樹爲山，有蓋天儀，激水隨滴而轉。”⁴⁸

北方寺廟園林化的表現則集中記載於《洛陽伽藍記》：“（景樂寺）堂廡周環，曲房連接，輕條拂戶，花蕊被庭。”（卷一）“（莊嚴寺）誦室禪堂，周流重迭，花林芳草，遍滿階墀。”（卷二）“（景明寺）屋簷之外，皆是山池，竹松蘭芷，垂列堵墀，含風團露，流香吐馥。”（卷三）“京師寺皆種雜果，而此三寺（指龍華寺、追聖寺、報德寺），園林茂盛，莫之與爭。”（卷三）“（永明寺）庭列修竹，簷拂高松，奇花異草，駢闐堵砌。”（卷四）⁴⁹

相比較而言，無論南北，市區及城郊寺廟的園林景物多爲嘉木珍果、奇花異草，而位居山林的寺廟園林，則多善於借助周邊環境的原生態自然景觀，從而形成開放式的園林景觀，與人爲的寺廟建築及園林營造結合起來，相得益彰，達至“造化本靈奇，人功兼製置”的渾然一體效果。⁵⁰

從總體上看，上述庭院或寺廟的景觀，仍然是不同程度呈現出“山水兼備，花樹交雜，野趣盎然”的特徵。如此景觀，與其說是展現了庭院的實用功能與寺廟的宗教意義，毋寧說是渲染了園林化的怡情審美氛圍。如果說庭院景觀的怡情審美化跟士人園林觀念由實用性向審美性演變關係密切，那麼，寺院園林的怡情審美化表現，或許更多是跟對佛教理想世界的追求與想像有關。⁵¹

46 《世說新語·棲逸》，《世說新語校箋》，頁360。

47 釋慧皎：《高僧傳·慧遠傳》，釋慧皎編：《高僧傳》（臺北：廣文書局，1976年），頁311。

48 許嵩：《建康實錄》（南京：南京出版社，2010年），卷17，頁355。

49 俱見楊銜之撰：《洛陽伽藍記》（臺北：明文書局，1980年），頁42，70—71，101—102，115—116，163—164。

50 王罔：《奉和往虎窟山寺詩》，《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2092。

51 且看支道林《阿彌陀佛像贊並序》對西天極樂世界的描繪：“館宇宮殿，悉以七寶，皆自然懸構，制非人匠。苑囿池沼，蔚有奇榮；飛沈天逸於淵藪，逝寓群獸而率真；閭闔無扇於瓊林，玉響自啗於簫管；冥霄實華以闔境，神風拂故而納新；甘露微化以體被，蕙風導德而芳流，聖音應感而雷響，慧澤雲垂而沛清。”載《全晉文》，卷157，《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2369。

二、隱逸與園林

就六朝的歷史範疇來看：建安正始，亂離迭遭，致使文士進退失據難以自全；五胡亂華，中原喪失，反而促進了江南大規模開發；南北分治，時局穩定，卻是內亂殺戮此起彼伏；寒門崛起，門閥動搖，進而引發士族社會分崩離析。

大致而言，六朝雖然有相對安定的承平時期，但仍以亂世為多。如南齊在一年(494)內換了三個帝王：鬱林王蕭昭業(473—494)、海陵王蕭昭文(480—494)、明帝蕭鸞(452—498)，改了三個年號：隆昌、延興、建武。六朝的皇族成員，尤其是文士化的皇族成員，往往就是王朝政治鬥爭的直接犧牲者，如齊竟陵王蕭子良在宮廷鬥爭中失敗，鬱鬱而終；梁簡文帝蕭綱、梁元帝蕭繹更是在“侯景之亂”中先後死於非命。⁵² 前文提到的入華林園“有濠濮間想”的晉簡文帝司馬昱(320—372)，一方面是“清虛寡欲，尤善玄言”、“留心典籍，不以居處為意”的文士化帝王，一方面卻也是一個苟活於桓溫淫威下的傀儡，“雖處尊位，拱默守道而已，常懼廢黜”，在位僅二百多日，最終憂憤成疾而逝世。⁵³ 這也是遠害全身的隱逸思想同樣體現在皇族成員等達官貴人身上的重要原因。事實上，晉簡文帝的“有濠濮間想”，以及王儉(452—489)《侍太子九日宴玄圃詩》所述“眷言淄苑，尚想濠梁”的現象在六朝上層社會已頗為普遍。⁵⁴ 歷仕齊、梁兩朝的裴子野(469—530)所作《遊華林園賦》，對皇家園林建康華林園的描述便可透見這一現象：“諒無庸於殿省，且棲遲而不事。譬籠鳥與池魚，本山種而有思。伊暇日而容與，時遨遊以蕩志。”⁵⁵

52 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八月，東魏降將侯景勾結京城守將蕭正德舉兵謀反。梁武帝被軟禁餓死，蕭綱先被立為傀儡皇帝，後被廢殺而立蕭棟，再廢殺蕭棟而侯景自稱帝，其他皇族成員或被殺或逃亡。承聖元年(552)二月王僧辯與陳霸先聯合擊敗侯景，十一月蕭繹稱帝於江陵，是為梁元帝；承聖三年(554)底，西魏大軍攻入江陵，元帝亡。

53 俱見《晉書·簡文帝紀》，載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219—224。

54 王儉：《侍太子九日宴玄圃詩》，《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1378。

55 裴子野：《遊華林園賦》，《全梁文》，卷53，《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3261—3262。

皇族尚且如此，何況一般文士？六朝文士的普遍現象就是：疏離朝廷政治，卻又難以徹底隱遁山林；於是，作為“第二自然”的園林，便成為六朝文士調和仕隱的最佳場所；寄情園林的隱逸，正是六朝文士在亂世中遠害全身的一種睿智及方式。即如北魏姜質《庭山賦》所云：“卜居動靜之間，不以山水為忘。庭起半丘半壑，聽以目達心想。進不入聲榮，退不為隱放。”⁵⁶以園林為隱所的風氣因而日盛。

歷來學界討論六朝隱逸，常會提及東晉王康琚《反招隱》詩的描述：“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⁵⁷中唐白居易（772—846）似乎是針對《反招隱》而作《中隱》詩曰：“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⁵⁸白居易將“大隱”解讀為“朝市太囂喧”委實言過其實。王康琚的“大隱”典範，是“老聃伏柱史”，即任周守藏室史的李耳老聃。無論是職位還是環境，守藏室史顯然都與“囂喧”扯不上關係。事實上，白氏所謂“中隱”，就其生存狀態及心態、或說處世態度與行為方式而言，即如“老聃伏柱史”般的“大隱”，亦即西晉夏侯湛（約243—約291）《東方朔畫贊》所推崇的“朝隱”：“退不終否，進亦避榮……染迹朝隱，和而不同。棲遲下位，聊以從容。”⁵⁹歸根結底，這也就是後人所說的“吏隱”。⁶⁰

在魏晉人的現實生活中，便有如“吏非吏，隱非隱”；⁶¹“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⁶²之類的現象。評山濤（205—283）語帶貶意，誅劉惔則為美言，二者都是孫綽（314—371）對魏晉吏隱現象的評述——身居吏位，卻應物無

56 姜質：《亭山賦》，《全後魏文》，卷54，《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3785。

57 王康琚：《反招隱》，《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953。

58 白居易：《中隱》，《全唐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1115。

59 夏侯湛：《東方朔畫贊》，《文選》，頁669。《文選》注引臧榮緒《晉書》云：“此贊為當時所重。”（頁668）王毅據此論析，認為“朝隱”由此成為隱逸文化主流，“朝隱”原則的確立是顯示士人園林勃興的最直接和最有力的動因，隱逸和園林生活由此發展為全面容納士人階層相對獨立性的豐富而完整的文化體系。參氏著：《中國園林文化史》，頁222—223。

60 “吏隱”一詞最早起於何時，已不可確考。從宋之問《藍田山莊》“宦遊非吏隱，心事好幽偏”，可知初唐文人已有此概念。參李紅霞：《論唐詩中的吏隱主題》，《深圳大學學報》，第26卷第6期（2009年11月），頁93。

61 《晉書·孫綽傳》引孫綽評山濤語，《晉書》，頁1544。

62 《晉書·劉惔傳》引孫綽誅劉惔語，《晉書》，頁1992。

累,不與時務經懷,無案牘之勞形;即亦仕亦隱,仕隱調和,將世俗利祿情懷與超然閒適心態結合起來。

白居易所推崇“隱在留司官”的“中隱”之士,雖然有多種生存形態,但還是多以園林為隱所:“歌酒悠遊聊卒歲,園林瀟灑可終身……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閒人。”⁶³六朝士人,亦多是如此表現。

六朝時期,園林廣布。《宋書·戴顓傳》載:“吳下士人共為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⁶⁴《洛陽伽藍記》卷四載:“飛館生風,重樓起霧。高臺芳榭,家家而築。花林曲池,園園而有。”⁶⁵石崇(249—300)的金谷園、王羲之(303—361)的蘭亭、劉勰(?—474)的東山、謝靈運(385—433)的始寧別墅、文惠太子蕭長懋的玄圃、湘東王蕭繹的湘東苑、茹法亮(435—498)的宅園、沈約(441—513)的東田、何尚之(382—460)的南瀕等,皆是當時有名的園林。這些園林,人為經營的痕迹甚為明顯(“築”、“聚”、“引”、“植”、“開”等動詞連用可見一斑),卻仍是“有若自然”。“若自然”已然為漢魏六朝士人造園思想的綱領性主張,除《宋書·戴顓傳》外,尚有如此記述:“(梁冀)又廣開園囿,采土築山,十里九陂,以像二嶠,深林絕澗,有若自然。”⁶⁶“園林山池之美,諸王莫及。(張)倫造景陽山,有若自然。”⁶⁷“(謝)舉宅內山齋捨以為寺,泉石之美,殆若自然。”⁶⁸此當肇啓了後人的造園(及賞園)思想:“平地變丘壑,安排若自然。”⁶⁹“山池別院,山谷虧蔽,勢若自然。”⁷⁰“雖由人作,宛自天開。”⁷¹

63 白居易:《從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全唐詩》,頁1152。

64 《宋書·戴顓傳》,沈約撰:《宋書》,《二十五史》,頁1644。

65 《洛陽伽藍記》,頁153。

66 《後漢書·梁冀傳》,范曄撰:《後漢書》,《二十五史》,頁772。

67 《洛陽伽藍記》,卷2,頁75。

68 《南史·謝舉傳》,李延壽撰:《南史》,《二十五史》,頁2599。

69 戴復古:《侄孫亦龍作亭於小山之上》其一,《石屏詩集》(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卷4,頁65。

70 李昉等:《太平御覽》,卷180,《居處部》,《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子部第200冊,頁894—725。

71 計成:《園冶·園說》,計成原作,黃長美撰述:《園冶》(臺北:金楓出版社,1987年),卷1,頁32。

“今得一院鼎新，林泉幽勝，景趣蕭灑，若自然化成。”⁷²“構怡園于里第之旁，築山引流，灘瀨平遠，有若自然。”⁷³凡此種種，莫不凸顯著“第二自然”向“第一自然”趨歸的追求與特色。

如前所叙，六朝官場昏暗，朝政紊亂。在這種政治環境氣氛下，文人難免會身在官場，心繫自然，但又難以決然掛冠歸隱，於是，“修營別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⁷⁴由此修建經營的別業⁷⁵園林，“選自然之神麗，盡高棲之意得……風生浪於蘭渚，日倒影於椒塗；飛漸榭於中沚，取水月之歡娛”，⁷⁶儼然成為這些文人亦吏亦隱、仕隱調和的勝地。

六朝士人隱逸的場所，雖然有多種選項，但落實為園林者不為少數。漢末士人之於園林已有如此表現：“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遊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木周匝；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躊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⁷⁷六朝文史資料更是多有如此記載：“瞻性靜默，少交遊，好讀書……厚自奉養，立宅於烏衣巷，館宇崇麗，園池竹木，有足賞翫焉。慎行愛土，老而彌篤。”⁷⁸“初，勛高尚其意，託造園宅，名為‘東山’，頗忽世務。”⁷⁹“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桃李茂密，桐竹成陰，眷陌交通，渠畎相屬，華樓迴謝，頗有臨眺之美……吾此園有之二十載矣，今為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閑隙，負杖躡履，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

72 《宋正直院碑》，阮元主編：《兩浙金石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卷7，頁157。

73 王士禛：《文靖王公神道碑銘》，《帶經堂集》，《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續修四庫全書》第141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卷82，頁96。

74 《宋書·謝靈運傳》，《宋書》，《二十五史》，頁1593。

75 所謂“別業”，指兼具居住、生產、遊娛多功能的園林式建築，園林的元素尤為突出。著名的有六朝謝靈運的山居，唐朝王維的輞川，皆為中國園林研究者所矚目。參周維權：《中國古典園林史》有關章節。

76 謝靈運：《山居賦》，《宋書》，《二十五史》，頁1593—1594。

77 《後漢書·仲長統傳》，《後漢書》，《二十五史》，頁808。

78 《晉書·紀瞻傳》，《晉書》，頁1824。

79 《南齊書·高帝本紀》，蕭子顯撰：《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9。

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⁸⁰

由上所引(及前引)詩文例可知，漢魏六朝時期，雖然某些山居別業式的園林，仍具有實用生產性的功能，但逍遙娛情、觀賞審美的思想觀念顯然已經貫徹到士人的造園活動與園林生活之中。可以說，六朝士人便是通過園林這一文化載體，以達到避塵世、脫世俗、寄情山水、嚮往自然生活狀態的理想境界，從而獲得心情的愉悅歡欣，心靈的恬靜安適。正如謝朓(464—499)所稱：“君有棲心地，伊我歡既同。”⁸¹這就是下文所要重點討論的六朝園林與士人隱逸思想互動關係的問題。

自從春秋以來，出處仕隱的矛盾就一直困擾著士人。⁸²至漢代東方朔，方掙脫“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的傳統觀念，得出“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⁸³的經驗總結。夏侯湛與孫綽等語可謂進一步的論述。李善《文選》注引臧榮緒《晉書》稱夏侯湛“此贊為當時所重”，⁸⁴《晉書·劉惔傳》在轉述孫綽為劉惔所作誄文後，也隨即強調“時人以為名言”。⁸⁵由此可知，“退不終否，進亦避榮……染迹朝隱，和而不同”及“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已由對東方朔與劉惔的個人品鑒，演化為時人所推崇乃至仿效的行為準則與生活方式。也就是將亦仕亦隱、仕隱調和、世俗利祿情懷與超然閒適心態結合的現象，由個體性的事實描述上升為普遍性的理論闡發。

據《晉書》本傳載，孫綽本人亦為“有高尚之志，居於會稽，遊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⁸⁶在《遂初賦》序文中，孫綽闡述了其山居別

80 徐勉：《為書誠子崧》，《全梁文》，卷50，《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3239。

81 謝朓：《和沈祭酒行園詩》，《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1444。

82 王毅在《中國園林文化史》第九章《士大夫出處仕隱的矛盾與隱逸文化的發展》（頁210—262）對此現象進行了深入分析。

83 俱見《史記·滑稽列傳》，司馬遷撰：《史記》，《二十五史》，頁271。

84 夏侯湛：《東方朔畫贊》，《文選》，頁668。

85 《劉惔傳》，《晉書》，頁1992。

86 《孫綽傳》，《晉書》，頁1544。

墅園林化的主導思想⁸⁷：“余少慕老莊之道，仰其風流久矣。卻感於陵賢妻之言，悵然悟之。乃經始東山，建五畝之宅，帶長阜，倚茂林，孰與坐華幕、擊鐘鼓者同年而語其樂哉。”⁸⁸史書又有載：“其（謝萬《八賢論》）旨以處者為優，出者為劣；孫綽難之，以謂體玄識遠者，出處同歸。”⁸⁹孫綽在此將“體玄識遠”作為“出處同歸”的前提，而“體玄識遠”便是一種心態/心境。可見，“以體玄識遠者則出處同歸”，即以玄遠心境，體識出（仕）處（隱）殊途同歸，可謂言簡意賅，闡述了調和仕隱的理論。此外，葛洪（約 283—343）在《抱朴子·應嘲》篇中所闡述的“出處一情，隱顯任時”，“出處同歸，行止一致”，⁹⁰以及鄧粲自詡的“夫隱之為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⁹¹與謝道韞評謝安（320—385）的“以無用為心，以顯隱為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異”等，⁹²也都同為調和仕隱的理論闡述。

這些闡述都為時人的隱逸實踐奠定了理論基礎。《晉書·孫統傳》載稱，孫綽之兄孫統“性好山水，乃求為鄞令，轉在吳寧；居職不留心碎務，縱意游肆，名山勝川，靡不窮究”，⁹³便是亦仕亦隱生活的實踐，亦即後人所謂“吏隱”。⁹⁴謝朓“既歡懷祿情，復協滄洲趣”，⁹⁵更是一語道破“吏隱”的核心價值。葛曉音便

87 周維權認為《遂初賦》序文體現了孫綽山居別墅園林化的主導思想。參氏著：《中國古典園林史》，頁 110。

88 孫綽：《遂初賦序》，《全晉文》，卷 61，《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 1807。

89 《世說新語·文學》注引《中興書》，《世說新語校箋》，頁 145。

90 葛洪撰：《抱朴子》（臺北：中華書局，1966 年），《外篇》，卷 42，《應嘲》，頁 1。

91 《晉書·鄧粲傳》，《晉書》，頁 2151。

92 《世說新語·排調》，《世說新語校箋》，頁 429。

93 《晉書·孫統傳》，《晉書》，頁 1543。

94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7 年出版的《辭源》對“吏隱”條的釋義為“謂隱於下位也”（上冊，頁 28）。此釋義不確。相比之下，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8 年出版的《辭海》對“吏隱”所作釋義，則為“舊謂不以利祿縈心，雖居官而與隱者同”（頁 45），僅言“居官”而不言官職高低，這種處理較為圓融。在學界的探討中，多採後義，故王維、白居易的隱逸，甚至某些京官的“朝隱”均歸入“吏隱”的討論範圍。參呂友仁、李慧玲：《杜詩、蘇詩、黃詩中“吏隱”注的澄清——輯本〈汝南先賢傳〉學術價值初探》，《淮北煤炭師範學院學報》，2008 年第 1 期，頁 1—3；葛曉音：《中晚唐的郡齋詩和“滄洲吏”》，《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50 卷第 1 期（2013 年 1 月），頁 88—103；蔣寅：《“武功體”與“吏隱”主題的發展》，《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4 卷第 3 期（2000 年 5 月），頁 26—31。

95 謝朓：《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1429。

將謝朓的“既歡懷祿情，復協滄洲趣”視為吏隱觀念的典範體現，並認為由此影響到中唐劉長卿（約 726—約 786）、韋應物（737—792）、張籍（約 767—約 830）、姚合（781—約 855）、許渾（約 791—約 854）、白居易等眾多運用“滄洲”典故反映吏隱情懷的詩作。⁹⁶

謝朓詩所用之“滄洲”典故，當出自東漢揚雄（前 53—18）《檄靈賦》：“世有黃公者，起於蒼洲，精神養性，與道浮游。”⁹⁷此處“蒼洲”，仍為傳統隱逸（隱於陵藪）之意。然而在謝朓詩中，“懷祿情”與“滄洲趣”並舉，顯然已是仕隱調和的表述，“隱逸”亦已聚焦為“吏隱”。

其實，“滄洲”典故的運用在六朝詩文頗為常見，諸如：“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⁹⁸“傍觀滄洲，仰拂玄霄。”⁹⁹“升嶠眺日軌，臨迥望滄洲”¹⁰⁰“心之所諳，咫尺千里；志之所符，滄洲暖然。”¹⁰¹“若乃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煙霞，高臥風月；悠悠琴酒，岫遠誰來？”¹⁰²“比談討芝桂，借訪薜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¹⁰³“訪迹雖中字，循寄乃滄洲。”¹⁰⁴“寒雲晦滄洲，奔潮溢南浦。”¹⁰⁵“孤飛出激浦，獨宿下滄洲。”¹⁰⁶等等。這些詩文，皆作於官場仕途，可謂置身官場，心向山林的吏隱志趣表述。

“吏隱”的途徑或還可有山水、宴遊、家居等，但如前所述，園林無疑是最為普遍且重要的，堪稱典範者莫過白居易的“歌酒悠遊聊卒歲，園林瀟灑可終身……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閒人”。¹⁰⁷以白居易的“中隱”個案而言，閒

⁹⁶ 參葛曉音：《中晚唐的郡齋詩和“滄洲吏”》，《北京大學學報》，第 50 卷第 1 期（2013 年 1 月），頁 88—103。

⁹⁷ 《文選》，卷第二十七，頁 384，“既歡懷祿情，復協滄州趣”句注引：“楊雄《檄靈賦》曰：‘世有黃公者，起於蒼州，精神養性，與道浮游。’”

⁹⁸ 阮籍：《為鄭沖勸晉王箋》，《全三國文》，卷 45，《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 1307。

⁹⁹ 王彪之：《登會稽刻石山詩》，《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921。

¹⁰⁰ 鮑照：《蒜山被始興王命作詩》，《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1282。

¹⁰¹ 謝朓：《與王儉書》，《全梁文》，卷 45，《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 3207。

¹⁰² 張充：《與王儉書》，《全梁文》，卷 54，《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 3268。

¹⁰³ 王僧達：《答丘珍孫書》，《全宋文》，卷 19，《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 2541。

¹⁰⁴ 袁粲：《五言詩》，《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1322。

¹⁰⁵ 柳惲：《贈吳均詩》其一，《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1674。

¹⁰⁶ 何遜：《詠白鷗兼嘲別者》，《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1707。

¹⁰⁷ 白居易：《從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全唐詩》，頁 1152。

職與園林(尤其是私園)似乎是兩個重要元素,換言之,作為一種生活形態的隱逸,須借助園林環境和淡泊逍遙的生活實踐來完成。然而,倘若是作為一種文化形態的隱逸,仍堅持擁有清閒官職及自家園林是必不可少的因素,則恐會有膠柱鼓瑟之虞。須知,歷代(當然包括六朝)的隱逸詩賦作品,不少便是“身在官場心繫自然”的產物。如一般都認為,東漢張衡(78—139)的《歸田賦》是身在仕途,心往閒逸之作,其中所描繪的隱居環境,全然為想像中的理想世界。¹⁰⁸同理,作為個案,白居易的“中隱”固然可以是一種基於現實物質條件的生存狀態,即擁有清閒的官職(太子少傅分司等)及自家園林(洛陽履道園等);然而,作為一種文化形態,隱逸所體現的更主要是一種心態、精神以及處世態度與行為方式,這就無關是否要擁有清閒的官職及自家園林了。六朝園林與隱逸的相關現象探討,亦可作如是觀。

劉宋人袁粲(420—477)的例子最具代表性:“(袁)粲負才尚氣,愛好虛遠,雖位任隆重,不以事務經懷。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每杖策逍遙,當其意得,悠然忘反。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¹⁰⁹袁粲官至劉宋中書監(形同宰相),開府儀同三司;可謂“位任隆重”(與白居易居太子少傅分司的位高權輕不同),卻是“不以事務經懷”,尤喜“獨步園林,詩酒自適”;當得知他人家園林“頗有竹石”,便逕自前往遊賞,且“嘯詠自得”。這正是基於其“負才尚氣,愛好虛遠”的個性與志趣,直可媲美白居易“歌酒悠遊聊卒歲,園林瀟灑可終身”的中隱生活。

袁粲的例子,不僅說明六朝“以園林為隱所”的現象,與是否清閒官職,沒有必然聯繫;還說明是否擁有自家園林,也並非是必然的聯繫。由此也可見,隱逸的實踐,關鍵在於心態、精神以及處世態度與行為方式,清閒官職及擁有園林以居以遊只是一種具體的表現形式。《南史·劉勔傳》載稱:“勔以世路糾紛,有懷止足,經始鍾嶺之南,以為棲息。聚石蓄水,髣佛丘中,朝士雅素者多往游之。”¹¹⁰劉勔“聚石蓄水,髣佛丘中”,固然是他自己以此實踐隱逸生活;而“朝士

108 參胡大雷:《文選詩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168—170。

109 《南史·袁粲傳》,《南史》,《二十五史》,頁2612。

110 《南史·劉勔傳》,《南史》,《二十五史》,頁2640。

雅素者多往遊之”，也應多有企望通過“往遊”他人園林，以達至自己隱逸心願者。畢竟，身在廟堂（“朝士”）而心懷山林（“雅素”），¹¹¹已見“心隱”；再往遊園林，便是將此“心隱”落實到園林之中。

六朝不乏此類借他人園林之景抒自己隱逸之意的例子。

《晉書·王徽之傳》載：“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徽之）欲觀之，便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灑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歡而去。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邪！’”¹¹²無論是他人竹還是自家竹，對於王徽之（？—約386）來說皆是“何可一日無此君”，顯示的則同是其崇尚自然、特立獨行的隱士風範。

無獨有偶，王羲之的弟弟獻之（344—386）也同樣癡愛園林，逕自往他人名園遊歷：“王子敬（獻之）自會稽經吳，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識主人，徑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燕。而王遊歷既畢，指麾好惡，傍若無人。”¹¹³此例所渲染的固然是王獻之簡傲不拘、任性使氣的名士風度，但其背景所彰顯的便是士人遊娛酣宴、寄情園林的吏隱風氣。

謝朓《紀功曹中園》也就是通過他人的園林，實踐自己（及園主）“永志能兩忘，即賞謝丘壑”¹¹⁴的隱逸願望（詳析見後文）。

當然也不排除說，園林除了寄寓隱逸思想，也可純為“遊賞”，尤其是以帝王或皇族為主導的園林活動（及其創作），“遊賞”主題更多為純粹且鮮明；¹¹⁵然而，倘若是以文士或文士化皇族為主導的園林活動（及其創作），這種“遊賞”大多即為隱逸思想及生活情趣的外化及泛化，白居易與六朝文士的園林詩都不乏此類作品。

111 “聚石蓄水，髣佛丘中”顯然是為“栖息”之意，同一語境的“朝士雅素者”亦當同此意願。

112 《晉書·王徽之傳》，《晉書》，頁2103。

113 《世說新語·簡傲》，《世說新語校箋》，頁416。

114 謝朓：《紀功曹中園》，《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1456。

115 最為典型者就是六朝歷代帝王、皇族所主導的春禊遊園活動及由此產生的詩賦創作。在這類遊園活動及由此產生的詩賦創作中，遊娛乃至饗宴的因素遠超於園林的因素。參王力堅：《六朝春禊詩初論》，《江蘇社會科學》，1998年第6期，頁145—151；王力堅：《齊梁饗宴文學論》，《中國文學學報》，第三期（2012年12月），頁199—228。

這種現象體現在文學創作中，便是園林之象（景象／畫面）的運用，旨在反映隱逸之意（心態／思想）；所描寫的園林是否屬於自己，甚至園林之象是否實景並非重要，重要的是隱逸之意的體現，誠如宇文所安所強調的：“詩歌展示的對象不是園林，而是詩人自己。”¹¹⁶探究其哲學思想的根源，或可追溯至六朝士人所謂“隱初在我，不在於物”，¹¹⁷乃至“此還有真意，欲辨已忘言”¹¹⁸之類的觀念影響。

三、六朝園林文學的定義、內涵及相關概念

目前學界對六朝園林的討論雖然不少，但鮮有放置在“文學”——尤其是“園林文學”——的背景或平臺來進行的。因此，本文在探討六朝士人隱逸與園林的關係時，尤為注重“文學”的元素，力圖由此凸顯並深入探析“園林文學”的現象。

李浩在多篇論文中倡言唐代文學研究應引入“園林詩”、“園林散文”的概念，並對唐代園林詩進行頗為深入的探討。¹¹⁹對此，筆者深以為然，並進而將此思考引入六朝文學研究領域。

在“向外發現了自然，向內發現了自己的深情”¹²⁰，重視自然景物表現與個人情志抒發的六朝文壇，作為“人化自然”（“第二自然”）的園林日漸成為文人筆下常見的描寫對象，這些園林描寫中，往往交織著士人隱逸思想及生活的表現，前文所引諸多詩文作品便頗為充分呈現這些特點，謝朓的詩作無疑最具典範意義。

如謝朓《移病還園示親屬》詩開首便稱：“疲策倦人世，斂性就幽蓬。”然而，

116 宇文所安著，陳引馳、陳磊譯，田曉菲校：《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文學文化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年），頁107。

117 《鄧粲傳》，《晉書》，頁2151。

118 陶淵明：《飲酒》其五，《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998。

119 李浩：《微型自然、私人天地與唐代文學詮釋的空間》，《文學評論》，2007年第6期，頁118—122；李浩、王書艷：《被遮蔽的幽境：唐代園林詩初探》，《陝西師範大學學報》，第39卷第1期（2010年1月），頁96—100。

120 宗白華：《美學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215。

其“幽蓬”並非遠離人世的深山老林,而只是清幽冷寂的園林:“停琴佇涼月,滅燭聽歸鴻。涼熏乘暮晰,秋華臨夜空。葉低知露密,崖斷識雲重。”詩末的“煙衡時未歇,芝蘭去相從”,則是以園中煙霧縱橫不歇、芝蘭枯榮相從的景觀,來喻示詩人隨緣順意,隱迹園林的心願。¹²¹

在《直中書省》中,謝朓開篇“紫殿肅陰陰,彤庭赫弘敞”以肅穆而幽雅的中書衙府帶入,繼而表示“信美非吾室,中園思偃仰”,顯示衙府生活並不是詩人所愛,他希望到園林去偃仰遊娛。在園林他可以“朋情以鬱陶,春物方駘蕩;安得凌風翰,聊恣山泉賞”——陶鬱於友情之間,駘蕩於春景之中,滿足其“以園林為隱所”的心願,將“吏隱”落實到了園林之中。¹²²

再看謝朓《紀功曹中園》的表現:“蘭亭仰遠風,芳林接雲嶸。傾葉順清飊,修莖佇高鶴。連綿夕雲歸,曖曖日將落。寸陰不可留,蘭墀豈停酌。丹纓猶照樹,綠筠方解籜。永志能兩忘,即賞謝丘壑。”詩中所描繪的,可說是頗為典型的園林景觀:亭台、林木、禽鳥、花樹、翠竹,加上詩人充分利用造園借景藝術,將大自然的景觀融匯進來:遠風、雲嶸、夕雲、落日,第一自然與第二自然渾然一體,人們遊宴其間(“蘭墀豈停酌”),油然而生隱逸之情:“永志能兩忘,即賞謝丘壑。”該詩此最後二句當可呼應《直中書省》末二句“安得凌風翰,聊恣山泉賞”。¹²³

謝朓這些詩的園林書寫,可概括出如此特點:以隱逸為旨歸,以氛圍的恬靜、生活的安適、景色的唯美為表徵。事實上,這也正是六朝園林文學的普遍表現特徵。本文所引眾多六朝文士的詩作、賦作,乃至各類史籍、書信所載的園林書寫文字,皆不同程度呈現出這麼一個表現特徵。

近年來,六朝文壇的園林書寫已開始受到學界的重視,韓國學者沈禹英便將“園林”的概念引入魏晉文學研究,提出“園林詩”的現象,並對此進行分析探討。¹²⁴中國大陸學者王春也將園林詩的發展追溯到魏晉南北朝時期,指出“文

121 俱見謝朓:《移病還園示親屬》,《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1435。

122 俱見謝朓:《直中書省》,《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1431。

123 俱見謝朓:《紀功曹中園》,《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1456。

124 沈禹英:《魏晉園林詩與生活美學》,載成功大學中文系編:《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10年),第六輯,頁265—281。

士園林與山水園林詩一起代表當時新的文化潮流”。¹²⁵

不過，從整體性來說，六朝園林及其跟隱逸現象與思想以及園林文學的關係，尚未得到學界更為充分的正視與重視。因此，我們有必要對此進行更具廣度與深度的探討研究，以期起到補苴罅漏的作用，作出具有開拓性的嘗試與貢獻。

從現有文獻資料看，學界有關“六朝園林文學”的概念確實甚為淡薄，大多是將之混淆於山水文學、隱逸文學之中。

因此，進行六朝園林文學研究，就有必要在文體上進行判析。衆所周知，山水、隱逸等題材皆指涉園林書寫。確切地說，三者有交集，但側重點不同。倘若以山水、隱逸各自為表現主體，園林只是附屬因素，便形成山水、隱逸不同類型的創作。其實，山水與隱逸二者互涉的現象便十分顯著，山水景物描寫中寄寓隱逸思想，隱逸生活描述中襯以山水景色，但不妨礙各自有山水文學與隱逸文學的形成及歸類。同理，當園林成為表現主體時，儘管也旁涉其他因素，仍可視為園林文學。李浩等在討論唐代園林詩時亦指出：“園林詩作為一種獨立於山水詩、田園詩又與其有交叉關係的詩歌類型，有著自己的特點。”並對唐代的山水詩、田園詩以及園林詩進行了深入細緻的釐析。¹²⁶ 本文要強調的是，雖然不排除有純然描寫園林的文學作品，但至於我們所關注的六朝園林文學，其園林景觀的描繪，結合隱逸思想的闡發與體現，無疑是重要的衡量標準。

事實上，園林不同於山水自然，是具有十分鮮明的人文因素的“第二自然”；與之相聯繫的六朝士人隱逸思想，也不同於傳統的“小隱”（隱於陵藪）。相比較而言，以人化景觀為表現主體的園林文學，所反映的隱逸思想多為閒逸自得、樂遊人生、怡情適意、出處相宜，此類表現南朝多於魏晉；以自然景觀為表現主體的山水文學，所反映的隱逸思想雖也不乏前者所具特徵，但或會多幾分幽玄哲思、高遠志趣、遣興縱情、遁世任性，此類表現魏晉多於南朝。反過來看，南朝隱逸思想之所以轉趨閒逸自得、樂遊人生、怡情適意、出處相宜，跟經歷了

125 王春：《園林詩對中國古典園林的審美觀照》，《湖北大學學報》，第38卷第3期（2011年5月），頁80—83。

126 李浩、王書艷：《被遮蔽的幽境：唐代園林詩初探》，頁96—100。

魏晉以降玄佛思想的浸濡沖釋有關。相對質性開放的山水而言,質性內斂的園林亦因此更為適應與契合這樣一種思想的轉化。

至此,本著循名責實的原則,我們有必要將園林文學從山水文學與隱逸文學中析分出來,以“第二自然”的園林文化與疏淡閒靜的隱逸思想及生活為構成要素,對“園林文學”進行定義:隱逸思想,是園林文學的精神內核,氛圍的恬靜、生活的安適、景色的唯美則為園林文學的表現特徵。六朝園林文學中,固然有純然描寫園林的作品,但更多是通過園林景觀來映襯、折射隱逸生活與思想(即前文所謂“隱逸思想及生活情趣的外化及泛化”)。準確地說,本文所關注的六朝園林文學,是較為全面地強調涵括:隱逸思想的闡發、恬靜氛圍的營造、安適生活的鋪寫,當然還有清麗景色的描繪。前文所引諸多六朝詩文賦作品,便在不同程度有如此表現。

至於園林文學中的隱逸思想內涵,或可從三方面解讀:政治姿勢疏離化(非脫離);生活態度怡情化(非憂患);自然觀念審美化(非實用)。

所謂“政治姿勢疏離化(非脫離)”,即與政治的關係並非是完全脫離,而是亦即亦離;疏離政治,固然才有可能免於憂患;而亦即亦離,也才能滿足現世物質生活的需求。於是,六朝現實中,少有陶淵明般的徹底歸隱,更多是山濤般的“吏非吏,隱非隱”,¹²⁷與劉惔般的“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¹²⁸

所謂“生活態度怡情化(非憂患)”,即沒有糾結於苦痛悲憤的憂患意識,而是轉向怡情逍遙的生活態度,一如謝朓的“君有棲心地,伊我歡既同”,¹²⁹與蕭綱的“我有逍遙趣,中園復可嘉”。¹³⁰

所謂“自然觀念審美化(非實用)”,即怡情園林的生活態度,自然導向審美的追求,於是便有紀瞻與徐勉般的景物審美化表現:“館宇崇麗,園池竹木,有足賞翫焉。”¹³¹“桃李茂密,桐竹成陰,眷陌交通,渠畎相屬,華樓迴謝,頗有臨眺

127 《孫綽傳》引孫綽評山濤語,《晉書》,頁1544。

128 《劉惔傳》引孫綽誅劉惔語,《晉書》,頁1992。

129 謝朓:《和沈祭酒行園詩》,《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1444。

130 蕭綱:《臨後園詩》,《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1966。

131 《紀瞻傳》,《晉書》,頁1824。

之美。”¹³²

這三方面的演化，皆落實到園林文化的範疇；於是，隱逸思想作為中介，連接朝野（亦吏亦隱／方內與方外），促進了園林文化的興盛，也促進了園林文學的興盛。正因如此，我們要特別注意隱逸思想與園林文化結合所產生的變化及其特點。

宇文所安在分析隱逸文化在中唐的變化時指出，中古（王按：即主要為六朝）的隱逸表現出私人性拒斥公共性的特點，到中唐，隱逸的主旨轉向對包孕在私人空間（private-space）裏的私人天地（private-sphere）的創造，而私人空間既存在於公共世界（public-world）之中，又自我封閉，不受公共世界的干擾影響。所謂私人天地當為士人的心境，而所謂私人空間，首先就是園林。¹³³ 其實，對比六朝可見：謝朓在府衙值班，生發“信美非吾室，中園思偃仰……安得凌風翰，聊恣山泉賞”¹³⁴的感慨；蕭子良則以皇族之身，在園林中享受“丘壑每淹留，風雲多賞會”¹³⁵的意趣。這些表現，已見出處相宜，而無傳統隱逸遁世避俗之態。據此可說，六朝隱逸文化與園林文化的關係，亦已在一定程度具有“既存在於公共世界之中，又自我封閉，不受公共世界的干擾影響”的特點。其實，也就是將隱逸思想亦即亦離的政治姿態，貫徹於隱逸文化與園林文化的互動關係之中。

然而，我們也需注意到，相比較於開放型的自然山水，園林相對內斂、封閉、狹小的有限實景，卻也蘊含著開放、遼遠的無限空間。造園藝術與隱逸思想的結合，則當會產生紆徐委曲、步移景異、對照映襯，乃至以小窺大、無中生有、虛實相交、物我渾然等效果；“壺中天地”、“咫尺山水”中，寄寓無遠弗屆的遐思冥想。六朝園林已具如此特色：“衆流漑灌以環近，諸堤擁抑以接遠。遠堤兼陌，近流開湍。凌阜泛波，水往步還。還回往匝，枉渚員巒……修竹葳蕤以翳薈，灌

132 徐勉：《為書誠子崧》，《全梁文》，卷50，《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3239。

133 《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文學文化論集》，頁89—91。

134 謝朓：《直中書省》，《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1431。

135 蕭子良：《遊後園》，《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1383。

木森沉以蒙茂；蘿蔓延以攀援，花芬薰而媚秀。”¹³⁶“崎嶇石路，似壅而通；崢嶸澗道，盤行復宜……泉水紆徐如浪峭，山石高下復危多。五尋百拔，十步千過。”¹³⁷庾信(513—581)《小園賦》更在開篇即道出個中玄機：“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壺之中，壺公有容身之地。”¹³⁸惟其如此，隱逸思想中的生活態度怡情化與自然觀念審美化，在園林文化範疇得以更為充分且具創意的發揮與呈現。

四、結 語

本文將園林文化、隱逸思想及園林文學三者作為一個相互聯繫的研究對象，以期獲得考察六朝文學的新視角。

以後世(尤其是明清時期)的標準來衡量，園林是包含有山石、水景、花木、建築和布局設計等元素的藝術化居遊空間；六朝時期的園林固然無法(也不宜)以後世的標準來衡量，但上述諸元素亦已不同程度呈現於六朝園林的建構與經營之中。而作為“第二自然”，六朝園林既有鮮明的人為經營表現，亦與山水自然保持密切的聯繫，“有若自然”的造園思想與借景的造園藝術在六朝園林的表現已顯而易見。¹³⁹

“居遊”無疑是園林的主要功能，但從六朝的文化生態上來考察，隱逸的因素亦當是至關重要的。作為生活形態的隱逸，無疑須借助園林環境和淡泊逍遙的生活實踐來完成；但作為文化形態，隱逸所體現的更主要是一種心態、精神以及處世態度與行為方式。於是，在六朝士人的文化生活中，園林更多呈現為別具象徵意義的“棲心地”；¹⁴⁰帝王皇族的“濠濮間想”、¹⁴¹“尚想濠梁”，¹⁴²以

136 謝靈運：《山居賦》，《宋書》，載《二十五史》，頁1594。

137 姜質：《亭山賦》，《全後魏文》，卷54，《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3785。

138 庾信：《小園賦》，《全後周文》，卷8，《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3921。

139 相比較而言，士人園林更見人為經營痕迹，皇家園林與寺廟園林則與山水原生態自然的關係更為密切。筆者對此另有專文探討，在此不贅。

140 謝朓：《和沈祭酒行園詩》，《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1444。

141 《世說新語·言語》，《世說新語校箋》，頁67。

142 王儉：《侍太子九日宴玄圃詩》，《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1378。

及“朝士雅素者”借他人園林之景抒自己隱逸之意的現象,¹⁴³也都得以順理成章的產生。

基於園林是具有鮮明人文因素而又具有山水兼備、花樹交雜、野趣盎然的“第二自然”；而經過玄佛思想的浸濡沖釋，隱逸思想由魏晉時期的幽玄哲思、高遠志趣、遣興縱情、遁世任性表現，漸進轉化為南朝時期的閒逸自得、樂遊人生、怡情適意、出處相宜；如此“第二自然”與隱逸思想的交匯，構成六朝園林文學有別於其他文學（如山水文學、隱逸文學等）的類型。¹⁴⁴

六朝文學研究歷來為學界的熱點，但六朝園林文學研究卻可說是方興未艾，大有持續發揮、多方發掘之空間——或可聯繫六朝玄學及佛學的形神說、言意說、色空說等，及其在造園思想及園林形制的表現上展開深入探究；或可結合詩、文、賦等文類，以及不同文類有關山水、隱逸、宴遊等題材的創作形態進行歸納辨析；或可有系統地比較探討不同類型文學作品中的園林景物描寫，以及隱逸思想在不同歷史階段及社會環境中的表現特徵。諸如此類的議題，均當以專題論文乃至論著的形式進行更具廣度與深度的研究。

然而，作為對“六朝園林文學”的初步探討，亦因篇幅所限，本文惟能集中通過從六朝諸多隱逸思想的表述及現象中，釐析出別具一格的亦仕亦隱思想，進而剖析六朝園林（主要為士人園林）與隱逸思想的對話關係——即二者所形成的互生、互涉、互動、交集、共構、影響等關係與意義；並通過對六朝園林文學的定義、內涵及相關概念，進行界定、釐析及初步討論，以期為日後對六朝園林文學的全面研究奠定基礎，從而為六朝文學研究開拓出新的思考方向。

（作者：臺灣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143 《南史·劉勰傳》，《南史》，《二十五史》，頁2640。

144 本結語以上的總結思考，受益於一位朋友的啟發，特此鳴謝。

引用書目

一、專書

二十五史編刊館：《二十五史》。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62年。

王士禎：《帶經堂集》，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續修四庫全書》第141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王毅：《中國園林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宇文所安著，陳引馳、陳磊譯，田曉菲校：《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文學文化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年。

阮元主編：《兩浙金石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

李昉等：《太平御覽》，《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吳功正：《六朝園林》。南京：南京出版社，1992年。

林敏勝：《六朝園林研究》。臺中：中興大學歷史所碩士學位論文，1996年。

周維權：《中國古典園林史》。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

宗白華：《美學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胡大雷：《文選詩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

計成原作，黃長美撰述：《園冶》。臺北：金楓出版社，1987年。

曹寅主編：《全唐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許嵩：《建康實錄》。南京：南京出版社，2010年。

遼欽立編：《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葛洪撰：《抱朴子》。臺北：中華書局，1966年。

傅晶：《魏晉南北朝園林史研究》。天津：天津大學建築設計及其理論博士學位論文，2003年。

楊銜之撰：《洛陽伽藍記》。臺北：明文書局，1980年。

蕭子顯撰：《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戴復古：《石屏詩集》。北京：線裝書局，2004 年。

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58 年。

釋慧皎編：《高僧傳》。臺北：廣文書局，1976 年。

二、論文

王力堅：《六朝春禊詩初論》，《江蘇社會科學》，1998 年第 6 期，頁 145—151。

王力堅：《齊梁饗宴文學論》，《中國文學學報》，第 3 期（2012 年 12 月），頁 199—228。

王春：《園林詩對中國古典園林的審美觀照》，《湖北大學學報》，第 38 卷第 3 期（2011 年 5 月），頁 80—83。

王鐸：《北魏洛陽的佛寺園林》，《華中建築》，第 23 卷（2005 年 7 月），頁 138—140。

呂友仁、李慧玲：《杜詩、蘇詩、黃詩中“吏隱”注的澄清——輯本〈汝南先賢傳〉學術價值初探》，《淮北煤炭師範學院學報》，2008 年第 1 期，頁 1—3。

李紅霞：《論唐詩中的吏隱主題》，《深圳大學學報》，第 26 卷第 6 期（2009 年 11 月），頁 93。

李浩：《微型自然、私人天地與唐代文學詮釋的空間》，《文學評論》，2007 年第 6 期，頁 118—122。

李浩、王書艷：《被遮蔽的幽境：唐代園林詩初探》，《陝西師範大學學報》，第 39 卷第 1 期（2010 年 1 月），頁 96—100。

吳功正：《六朝園林文化研究》，《中國文化研究》，1994 年第 1 期，頁 108—117。

沈禹英：《魏晉園林詩與生活美學》，載成功大學中文系編：《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10 年），第六輯，頁 265—281。

金大珍：《北魏都城洛陽在中國歷史文化上的地位——〈洛陽伽藍記〉研究之一》，《大同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 17 卷第 3 期（2003 年 9 月），頁 37—39。

曹道衡：《北朝社會環境對學術和文藝的影響》，《周口師範學院學報》，第 22 卷第 1 期（2005 年 1 月），頁 1—9 轉 24。

曹頌今：《北魏都洛四十年洛陽佛寺的變遷》，《洛陽工業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 10 卷第 4 期（2000 年 12 月），頁 38—40。

葛曉音：《中晚唐的郡齋詩和“滄洲吏”》，《北京大學學報》，第 50 卷第 1 期（2013 年 1 月），頁 88—103。

蔣寅：《“武功體”與“吏隱”主題的發展》，《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4 卷第 3 期（2000 年 5 月），頁 26—31。

鄭在書：《苑囿：書寫帝國的空間——以〈子虛〉、〈上林〉兩賦為例》，載李豐楙、劉苑如編：《空

間、地域與文化——中國文化空間的書寫與闡釋》(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02年),頁133—155。

盧有泉:《孕育北朝文學的獨特文化土壤》,《名作欣賞》,2013年第11期,頁4—6轉14。

Garden and Seclusion : New Thinking of Six Dynasties Literature

Wang Lijia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Abstract:

Seclusion is socially common, while gardening is culturally common in the Six Dynasties. In many of the scenery descriptive poems, gardens are the objects usually portrayed, thus formed the style of gardening literature. In fact, seclusion, gardens and gardening literature are close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Garden is the cultural carrier of seclusion ideology and is related to literature creation; the seclusion ideology generates the popularity of gardens, and in the same time develops and presents through gardening. When seclusion ideology evolves by gardens is converted to writings, it commences the prosperity of gardening literature in the Six Dynasties. Through the gardens as cultural carrier, the literati in the Six Dynasties expect to live a sequestered life, place their feelings in landscapes and wildness by living in a natural and ideal way, so as to preserve their individuality and refine their spirit. All these embody utterly in the gardening literature of the Six Dynasties.

Keywords: the Six Dynasties, garden, seclusion, garden literature